



余云开,28岁,云南省文山州人,2007年来京旁听为出书



范国梁,52岁,浙江兰溪人,今年来京,旁听是为研究先祖古籍



常俊曙,26岁,河南平顶山人,2009年来京,为考研而旁听

“蜗居”在北大清华的旁听生们

在北大清华等高校游学的旁听生数以千计,从二十岁出头到年过花甲。日前,记者采访这一群体,他们倔强地坚守着自己的梦想,在京过着窘困的生活,未来的出路更是渺茫。 据《新京报》

来 心存梦想 弃家旁听

26岁的常俊曙是北京大学红三楼保安员,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旁听生。每天下午5点至次日清晨,是常俊曙工作时段。“我喜欢北大,夜里在这上班,白天在这听课。”他说。

来自河南平顶山的常俊曙,小时的梦想就是考上北大这样的高等学府,“上高中时,我的成绩其实不错,但临场发挥不好,只考上了大专。”毕业后,他

当过代课教师,也干过苦力。但始终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,“没有时间读书”。两年前,征得父母同意后,常俊曙揣着1000元钱来到北大旁听。

43岁的北大旁听生施经军,当兵退伍后,考过公务员,应聘过报社,但限于高中学历没能实现。为了生计,他到工地打工。心怀文学梦,身处工地中,结婚生子的施经军曾数次提出到北京闯

一闯,都未实现。39岁那年,想为自己的文学梦最后一搏,施经军对妻子说:“如果我再不去北大,也许永远就没机会了,哪怕是去看一看也行!”

今年2月,52岁的浙江菜贩范国梁来到北京,成为北京大学的一名旁听生。临行时,他对妻子说“先去看看”,但他心里想好了两三年内不会回去。只读过三年书的他,想重新修订先祖古

籍。有人佩服他的勇气和毅力,有人认为这是不切合实际的梦想,是中国版的“堂吉珂德”。

跟年轻的旁听生不同,69岁的李文超说,他来北京高等学府旁听的目的,“只想学习知识,没有功利性,毫无旁念。他们想要更好的生活。”这位贵州的老人,2000年退休后,这次赴京,是到北大和清华旁听博士生课程。

留 生活窘迫 “半工半读”

嘴上说着“先去看看”,进了北大、清华的课堂,这些旁听生都舍不得走。但吃住等现实问题,也是他们必须考虑的。常俊曙的1000元钱,到北京后很快就花完了。租了房子、买了电脑和各类生活用品,范国梁已花了8000多元。经济开始紧张的他,不好意思跟老家的妻子要钱,暂时接受朋友的支援。

找个工作,边打工边读书,是大部分旁听生的选择。常俊曙找过很多单

位,还被中介公司骗过钱。一次在北大校园里,他问起一名保安员是否招人,于是成了北大的保安。北大红三楼一层的楼梯间被一道半米宽的木门隔出来,里面不足4平方米,放一张床、一张桌、一把椅,这就是常俊曙的住处。每月1000多元的收入,让常俊曙对现状很知足。

施经军在北京找了一份企业内刊的工作,单位也给安排了住处,生活相对稳定。“单位的领导看过我写的文章,觉

得我有点才华,同意我和那些本科生一起被录用。”他说。2000多元的月薪,他把其中一多半寄给妻子,留下1000元用于生活。

相比上述两人,旁听生余云开更窘迫。28岁的他来自云南,2007年来京时,租住的是香山附近一间5平方米的平房,月租200元。距离大学较远,他每天凌晨5点起床乘车去学校,晚上9点半才回家。房东李云霞说,小房没有暖

气,只有一张两尺宽的木床。余云开每天很少说话,就是看书。

“最难的时候一两天吃不上饭,我只能给弟妹打电话,让他们寄一些钱给我,或者找熟人借钱。”余云开说,他从不下馆子,都是自己在家做饭吃,但不管怎样节省,伙食费和房租加起来,一个月也至少需要500元。来京旁听已4个年头,余云开没有羽绒服,没有棉服,过冬只穿一件厚一些的夹克。

惑 身份特殊 倍感孤独

矿业大学附近的一家地下招待所,一张每月400元的床位,是旁听生李文超的住处。他已是这里的名人,前来采访的记者来过一拨又一拨。但住招待所里的其他人并不羡慕,一些人还忍不住悄悄告诉记者,“劝他回去养老,他不听,这么大岁数读什么书?跟我们也没什么可说的……真难以理解。”

“孤独?我不孤独,我每天都去听课,晚上9点半才回来,一切都挺好,挺

丰富的。”李文超回应记者问题时,言语间似乎在掩饰什么。

多名旁听生说,有时教室里同学太多,座位全满,旁听生只能自己搬把椅子坐在过道里,“我们怕异样的眼神。”

事实上,和其他学生的年龄、基础、学历上的差距,注定旁听生们无法真正融入正式生的群体,孤独如藤蔓般缠绕着他们,而旁人的言语也常常不咸不淡。

常俊曙说,吃住、读书、工作全在北

大校园里,这里已经成了他的家,但是有的“家人”并不看好自己。去年,常俊曙第一次考研落败,保安队里的一些人觉得这样的结果再正常不过。北大校园里一名保安员说,队里知道常俊曙在考研的保安员都会议论,“人家正式本科生都未必能考上,更别说他是大专毕业了。”

如何面对孤独,破解孤独,施经军这些年一直在努力着。虽然靠自己努力,他在一家公司得到编辑内刊的工作,

但那些比他年轻、学历高的同事们并不怎么愿意接近,甚至排挤这个只有高中学历的外乡中年男人。

“我喜欢在不同的高校旁听,一间教室几十人的‘大课’,学生们之间也都不太熟,更没人知道我是谁。”这种群体性的陌生,让施经军坦然了许多,他主动和同学说话,向老师提问,课后通过邮件方式和老师沟通。他参加学校的英语沙龙、文学社,到国图听各种讲座,设法让生活丰富起来。

问 “代价太大” 出路在哪?

范国梁跟妻儿未说明来京当旁听生,“如今家乡媒体报道我了,妻子肯定知道了,可她没问,我也不说。”虽然觉得并非长久之计,他还是决定“先拖着吧”。

但出路又在哪里?无论是已旁听15年的柳哲,还是刚到京1个月的范国梁都面临着思考和选择。王小兵通过旁听和复习,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,如今在香港中文大学读博。他说,自己是比较幸运的一个,“很多旁听生都想通

过这个途径改变命运,但代价太大了,现实能把人的精神压垮。”

得知王小兵的经历,常俊曙很兴奋,“这正是我要走的路,考研,考博,最好以后能到大学里任教、搞学术。”

今年1月,常俊曙第二次考研,报的是北大中文系。专业课全都及格了,但38分的英语成绩拖了后腿。“如果这次还没考上,就再考一年。”

穿梭于北大、清华、人大、航天航

空大学,施经军度过了4年。已有文章见诸报纸的副刊,他觉得离自己的文学梦越来越近了,“我喜欢读《白鹿原》,我想写一部这样的著作,但我现在水平还不够,还得继续读书、努力。”

余云开正在修改的一部书稿,12万字。此前寄给了多家出版社,只有一家出版社的编辑给了他回复,说稿子需要改。余云开现在在问或去旁听,

也辞去兼职工作,专心改稿。

北京大学中文系原办公室主任张兴根老师认为,求学路有很多条,可自学,可上网听远程教学,尤其是自身基础、经济条件和适应能力相对薄弱的学生,要从自身条件考虑,否则生活压力大,旁听的负担太重。而旁听生身份的特殊性,也让他们在心理上产生自卑感和孤独感。